

主编 ◎舒大刚

JingXueNianBao

经学年报

2010年



经学年报2010年

主编 舒大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年报2010年 / 舒大刚主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11-3513-2

I. ①经… II. ①舒… III. ①经学—中国—2010—年报

IV. ①Z12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3215号



经学年报2010年

Jing Xue Nian Bao 2010 Nian

主 编 舒大刚

执行主编 李冬梅

- | | |
|------|--|
| 责任编辑 | 奉学勤 |
| 责任校对 | 愚 夫 |
| 责任印制 | 唐 茵等 |
| 封面设计 | 邹小工 |
| 版式设计 | 四川省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成都市槐树街2号 |
| 网 址 | www.scwys.com |
| 电 话 |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
| 传 真 | 028-86259306 |
| 读者服务 | 028-86259293 |
| 邮购地址 |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 印 刷 |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180mm×260mm 1/16 |
| 印 张 | 25.5 |
| 字 数 | 568千 |
| 版 次 | 2012年6月第一版 |
| 印 次 |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
| 书 号 | 978-7-5411-3513-2 |
| 定 价 | 96.00元 |

《经学年报2010年》编委会

主 编	舒大刚
执行主编	李冬梅
编 委	王智勇 尹 波 杨世文 李文泽 吴洪泽 郭 齐 舒大刚 彭 华

目录

Contents

经学研究

经学总论研究	郑 伟	1
经学历史研究	郑 伟	9
《周易》研究	李东峰	30
《尚书》研究	王小红	45
《诗经》研究	李冬梅	67
“三礼”研究	潘 斌	94
《春秋》研究	张尚英	111
“四书”研究	梁 冰 钟雅琼	140
《孝经》研究	梁 冰	166
《尔雅》研究	霞绍晖	171

儒学文献研究

儒史文献研究	仇利萍	179
儒家诸子文献研究	仇利萍	193
儒家礼教文献研究	仇利萍	211
出土儒学文献研究	彭 华	219
《儒藏》编纂与儒学文献整理	杨世文	229

儒学大事编年

2010年儒学大事编年 彭 华 232



论著目录汇编

经学总论研究论著目录 郑 伟	242
经学史研究论著目录 郑 伟	244
《周易》研究论著目录 李东峰	251
《尚书》研究论著目录 王小红	255
《诗经》研究论著目录 李冬梅	261
“三礼”研究论著目录 潘 斌	300
《春秋》研究论著目录 张尚英	308
“四书”总论研究论著目录 梁 冰	326
《论语》研究论著目录 梁 冰	327
《孟子》研究论著目录 钟雅琼	335
《大学》《中庸》研究论著目录 钟雅琼	346
《孝经》研究论著目录 梁 冰	350
《尔雅》研究论著目录 霞绍晖	352
儒史文献研究论著目录 仇利萍	355
儒家诸子文献研究论著目录 仇利萍	367
儒家礼教文献研究论著目录 仇利萍	384
出土儒学文献研究论著目录 彭 华	389

经学总论研究

郑 伟

(四川大学古籍所, 四川成都, 610064)

2010年,关于中国经学总论的研究,共计专著2部,期刊论文22篇,论文集12部。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经学的价值与地位,二是经学与诠释学,三是经学流派分期和经籍整理研究,四是经学与小学。经学总论的研究,通常以经典和经学流变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学科内部探讨经学的发展与流变。本年度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以经学为立足点,辐射其他学科,通过与其他学科关系(特别是诠释学)交互影响的研究,以期拓展经学总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经学的定位与发展提供新的解释力。

一、经学的价值与地位

关于经学的价值与地位,是本年度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涉及经学与国学、经学与儒学、经学与传统学术、经学与社会、经学与制度,以及经学与哲学、政治、文学、史学、医学等学科关系的论述。

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4日第15版)指出,国学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国学里面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对于经学本身,应有全方面的研究。不仅仅要做经学史的研究,也应该做经学本身的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上,“经”的作用与地位与“史”是不一样的,不能认为“经”与“史”是相等的。清代学术的一个特点,就是门户之见。编写经学史,不能从门户的角度看经学史、学术史的发展,那样会造成很多问题。冯友兰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中国哲学史首先是一个子学时代,然后是一个经学时代,但这个说法可以修改,因为《诗》《书》《礼》《乐》都不是在孔子那个时候才有的,而是在孔子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崇高的地位。孔子“述而不作”,删定“六经”,也是做经学的工作。所以说经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可是并不

意味着当时就没有经学，孔子传播的六艺与其他学说是完全平等的。

王鸿生《儒学向经学转变的意蕴及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指出，着眼于中国传统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演变，“儒学”与“经学”有不同含义。儒文化的根在西周，儒学乃发端于孔子，经学则始于汉，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向经学演变。这为儒者开辟了政治的通路，但儒学发展的文化空间受到了限制。这是传统文化意义上学术和政治关系的一种新模式。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董仲舒的理论相对于先秦的儒文化，在理性层面有一种退化，在价值和理想的层面则有一种淡化。这是“儒学”转变为“经学”的代价。对皇权政治体制而言，经学并非其遵循的常道，而只是其常用的思想工具。儒学文化命运中蕴涵了一个悖论：要实现儒学的价值理想，就必须诉诸政治权力；而儒学一旦与政治权力结合，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真儒的价值理想。虽然经化的儒学从伦理层面为皇权的正当性提供文化解释，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由于受到皇权的影响，经学在建构精神家园方面始终难以超越纲常名教的藩篱，也不能在孔孟之道基础上实现政治理念的革命，没能直接转化成引领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晚清废科举和辛亥革命使儒学在新的文化平台上回归学术的本位。当代中国人可在儒学基础上创新中国文化。

边家珍《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 月）以经学传统为支点和视角，探讨古代学术文化形态的特质及优劣。是书凡六章，第一章《经学传统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回溯经学传统的生成机制以及经学传统成立的客观现实性；第二章《经学思维方式与中国古代学术品格及方法论特点》，指出经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以及对汉代以降中国学术基本品格之影响；第三章《通经致用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重点分析经学传统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第四章《今文经学的得失及其学术文化影响》，指出今文经学所确立的天人合一观念、夷夏之辨、大一统观念，是传统知识分子自觉实践的认识前提和践履途径；第五章《经学的考证、疑辨传统及其学术价值评估》；第六章《从中国经学传统看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分析传统经学方法与西方科学主义发生的碰撞与融通。该书力求做到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相统一，注意史论结合，对于理解、把握经学传统及中国古代学术文化都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为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黎志敏《“哲学”与“经学”之争：中国传统伦理的历史拐点》（《伦理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指出，中国传统经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包含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它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统领和灵魂。20 世纪初期，西方哲学被纳入中国学术体系，并取代经学成为中国知识体系的统领，中国学术体系至此被逐渐全盘西化，以并无伦理道德品质的西方哲学取代中国传统经学，中国知识体系原有的伦理道德品格也逐渐消失。中西文化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西方学者可以一方面在知识体系之中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去教堂获得伦理道德素养；而中国学界的伦理道德品质并无宗教信仰可以依托，西方“哲学”无法代替“中国之伦常名教”，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文化价值信仰体系。因此，剥去知识体系的伦理道德品格就从根本上为中国学界的道德大滑坡埋下了伏笔，其不良后果在当代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中国知识体系需要重构，恢复伦理道德

学说的统领与灵魂地位。

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指出，经学对传统社会的影响，是通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建构而得以实现的。从经学的立场考察历史的制度与古人的生活，制度与生活便呈现为经学历史性展开的经验。经学是文明的大经大法，其意义在于其提供了不变之常法，而为政教之根源。制度是经学展开的经验，可以直接指导政治、社会的规范，具有塑造人心的功能。汉代学术的影响主要在国家制度，即“依经立制”和“引经决事”，强调六经的教化功能，构建家国通贯的政制，从而实现政治的正当性、家族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宋代学术的影响主要在社会制度，以“五经”为源头，结合当时的实际，通过礼乐损益，制作乡约、族法、家礼，规定了冠、婚、丧、葬等礼仪，规范百姓的日常生活。生活是制度的教化，不同的制度又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活。汉唐之间，经学通过皇纲政制而影响一般社会生活。宋明之后，儒学通过社会礼仪的制作，构建一种合理的共同体生活。

刘朝谦《经学时代文艺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外文化与文论》2010年第1期）指出，汉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框架主要由四种文艺理论形态支撑：王官学文艺理论、诸子文艺理论、经学文艺理论和赋体文艺理论。王官学文艺理论由周代和汉代的王官学所构成。诸子文艺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自我产生的动力源，是思考重大文艺问题时所最早展现出来的正题和反题双向进路。经学文艺理论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被经学树立为神圣经典中记载的文艺理论，二是经学人物对神圣经典所记载的文艺思想、理论的阐发。其代表着经学时代国家最高的政治意志，承负着中国文艺理论几乎全部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赋体文艺理论属于非文艺理论时代向文艺理论时代转型时具有过渡性质的理论，具有作为以文艺本身为本位的文艺理论的特质，是中国以审美为本位的文艺理论的历史性开端。

黄震云、马宗昌《经学与中国政治文明》（《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学苑出版社，2010年1月）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文心理和中国政治文明都与经学密切相关，经学的兴衰往往成为社会兴衰的标志。经学产生于特有的文化生态和天下一统的社会环境，是社会政治文明，是盛世文化，具有天经地义的权威性，形成了以“十三经”为标志的经学典籍。唐代对经学继承、开发和利用，对礼乐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盛唐之音，直接推动了整个亚洲乃至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清代以来的民主政治与东西文化的冲突，告诉我们经学思想有助于当代社会的进步发展，对儒学重新加以重视才是最科学的态度。

周琦《今古文经学对〈内经〉学术传承的影响》（中国中医科学院2010年博士论文）将经学与《内经》中今古文字差异进行比对，通过对今古文经学五行理论与《内经》诸篇中的五行理论的对比分析，论证今古文经学之争深刻地影响着《内经》某些理论的形成，而今文经学“通经致用”和古文经学“名物训诂”的治学理路，则深刻影响了以王冰和杨上善为代表的后世医家对于《内经》注疏的趋向。

黄开国《儒学与经学探微》（巴蜀书社，2010年9月），选录作者自1984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以来，至2009年期间的重要论文共25篇，涉及对《周易》、《诗经》、《左

传》、《公羊传》、《论语》、谶纬文献、儒家人性论、儒家学派、西汉与晚清经学大势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与阐发，其中收录书评 5 篇。论文包括：《论汉代谶纬神学》《廖平与经学的终结》《独尊儒术与西汉学术大势》《汉代经学博士考辨》《〈左传〉与〈诗经〉》《〈左传〉、〈国语〉与〈易经〉》《析〈太玄〉架构形式》《中国古代人性发展论略》《战国儒家人性论及其意义》《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总结》《儒家性品级说的开端》《董仲舒〈公羊〉学方法论》《论儒家的孝道学派——兼论儒家孝道学派与孝治学派的区别》《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转型》《庄存与〈春秋〉学新论》《宋翔凤〈论语〉学的特点》《刘逢禄〈公羊〉学的意义》《略论刘逢禄对〈左传〉的攻毁》《〈公羊传〉的形成》《从〈教学通义〉看康有为早年的思想》《董学研究的突破与超越——读〈董学探微〉》《气论研究的重要成果论》《〈谶纬论略〉评介》《精密稳妥 疏通百家——读钟肇鹏先生主编〈春秋繁露校释〉》《中国哲学的根源性重建——读郭齐勇先生〈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

二、经学与诠释学

经学与诠释学的研究，是近年出现的热门话题。学人借鉴西方的诠释理论，探讨中国本土的诠释学传统及其特征，并主张建构中国经学诠释学，提出不少有价值的看法。

杨端志《“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周易研究》2010 年第 5 期）指出，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中国的文本诠释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论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它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在《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杨乃乔《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天津社会科学》2010 年第 2 期）指出，在以经学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积淀着方法完备、思想丰沛与体系宏大的诠释学传统，这一切都呈现在孔子删“六经”及历代经学家对“十三经”给予的诠释与研究中。在儒家经典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上，“传”、“注”、“疏”、“笺”、“正义”、“章句”、“训”、“训纂”等，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技艺学诠释学体系，其中沉积着丰沛的存在论诠释学思想。对经典进行理解与解释，必然呈现出重大的意识形态意义及生存论意义。如果对经学阅读与研究的学术感觉依然驻留在如何通过注经的技艺和方法，而面向“十三经”文本，并且力图获取其原初意义，这显然曲解和误读了中国经学诠释学。中国经学诠释学不是方法论问题，而是存在论问题，即便是古文经学的注经原则也不能因其操用一套训诂、考据等小学的技艺，而被简单地视为方法论。中国经学诠释学发展史在技艺学诠释学与存在论诠释学两个层面上证

明了：一部中国经学诠释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历代释经家的自我理解史。

钟厚涛《“经学诠释学”构建的任务旨趣与路向规划》（《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指出，经学是关于“义理”的阐发诠释之学。现代学科的规划和重组，让经学与诠释学近乎失之交臂，“经学诠释学”的构建具有较为迫切的现实需求。“经学诠释学”的构建背后交织了多重力量的博弈，其主要难题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和如何澄清其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问题。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经学诠释学，必须将之视为正在处于生成过程当中的理论建构，同时还必须努力从中激活富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因子，要有足够的思想去应对当下和未来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才能真正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而跨文化对话交流中的意义理解和意义诠释问题正是这一答案。

王中江《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原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后收入《国际儒学研究》第17辑，九州出版社，2010年1月）指出，以往认为儒家经典的统一定型及其诠释是从汉代开始的，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和传世文献一致证明，儒家经典诠释学诞生于东周时代的早期儒家，儒家信仰的经典在东周时代已经基本定型，其经典的传授、学习和诠释在当时的儒家内部业已普遍，并产生了表示经典诠释行为、活动的“传”、“解”、“说”、“记”等术语及其作品。这是新文献为早期儒家提供的新的历史记忆。

三、经学流派分期与经籍整理研究

黄开国《经学流派与分期新议》（《光明日报》2010年9月20日第12版）指出，经学的分期、分派不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时期的经学必有相应的特征，这个特征既是经学分期也是经学分派成立的根据。经学的分期、分派都应该从其训释历史的变化来把握。依经学发展史上典籍训释变化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三个派别。从汉到唐为第一期，是经学发展的早期，以寻找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论证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并为其主要任务。因以训释“五经”为主的学派，从经学分派而言，可称之为“五经学派”。宋元明为第二期，是经学发展的中期，经学的内容也转到了以伦理为主的方向，天理、心、性等成为最重要的术语，道德伦理及其修养成为讨论的重点。经学训释的重点从“五经”转到了“四书”，从经学分派说，可称之为“四书学派”。清代为第三期，是经学发展的晚期，以考证经典文字的形、声为重点，经学重视的不再是内圣外王的义理发明，而是重在文字训诂的成就。是以《尔雅》《说文》为据的学派。从经学分派说，统称之为“《尔雅》学派”。从三个时期的经学内容看，早期以外王为主，中期变为以内圣为主，晚期变为以文字训诂为主，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晚期经学由重视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的考证，而发展出的实际上是各门各类的分科之学，如辑佚、音韵、金石学、史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这是对经学的性质、方向的否定，是经学的终结。

雷斌慧《从经部目录的流变看经学思想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

例》(《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指出,从经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六艺略发展到经部,经部从无到有,经部分类的调整及类目的增加使尊经为旨的书志体学术史得以确立并获得发展。《易》《书》《诗》三类的书目传承与书目的净化和细化,透露古文经学重兴的消息。同时,尊经崇实的精神贯穿三部目录始终并持续发展。《礼》《春秋》《论语》类的书目细化及入目分歧,既是目录学发展明晰化的反映,也与经学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

袁行霈《“五经”的意义与重译的空间——在“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上的致辞》(原载《周易研究》2009 年第 5 期,后收入《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1 期,中华书局,2010 年 5 月)指出,翻译中国经典是西方汉学界的学术传统,在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翻译“五经”,是很有必要的。翻译“五经”有三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是底本的选择,底本的选择得当与否,对翻译的水平有很大的影响;其次是对内容的诠释,我们应当广泛参考吸收,同时又要站在今天的高度,提出我们自己的见解;第三是翻译的准确和译文风格与原诗的统一。

程苏东《再论“十三经”的形成与〈十三经注疏〉的结集》(《国学研究》第 25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6 月)指出,目前学界普遍以《孟子》由子书升经作为“十三经”确立的标志,而将“十三经”的形成定于宋代。而“十三经”的格局并非确立于宋代,这一概念由产生到确立,实与南宋中后期至明代中期汉学思潮逐渐兴起的过程相始终,“十三经”与《十三经注疏》乃是明代嘉靖前后主张反思宋学一统,重兴汉儒经学的学者的一面旗帜。

日本学者水上雅晴《〈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以及段玉裁的参与》(《中国经学》第 6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6 月)指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是阮元幕府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段玉裁也参与了校勘工作。《校勘记》圈识前后的校语并不是同时撰写的,也不是由同一人写的。它具有双层结构,在不少场合,圈识前后校语的内容不同,可能表明分校者与段氏的校勘工作是分别进行。分校者顾广圻在校语中点名批判段玉裁的校勘工作,而段玉裁在自己的校语中累次对“旧校”即顾氏的校语加以攻击。《校勘记》中保存了分校者与主纂者相互批评对方的表现,证明《校勘记》的校语基本上没有改变。

古风主编《经学辑佚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 8 月)全 22 册,该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重点项目,以传统经学分类为原则,利用前人辑佚成果,通过影印方式搜集整理传统经学辑佚文献。第一次将两汉以来的经学散佚文献,从诸多后代辑佚丛刊中辑选出来,按照《易》类、《书》类、《诗》类、“三礼”类、《乐》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孟子》类进行分类整理成书。各种佚经,以类相从;同类佚经,划分子目;每种佚经,单列成篇,各具提要;版本择取,首用精良,兼收诸版,以存线索。在现有研究经学史、汉魏史征引的佚经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这些经过清代学者初步整理的资料宝库,对研究经学史、汉魏史,建立统一的学术规范,对促进各专题史的研究,特别是经学史,有独到的价值,对于相关领域研究视野的逐渐扩大、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具有重要作用。

舒大刚、吴洪泽、尹波主编的“20世纪儒学大师文库”，拟对上世纪的儒学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收录和整理，以上续《儒藏》。本年度选编了《钱基博儒学论集》（王玉德编）、《章太炎儒学论集》（上下册，王小红编）、《吴之英儒学论集》（潘斌编）、《皮锡瑞儒学论集》（潘斌编）、《刘师培儒学论集》（黄锦君编）、《龚道耕儒学论集》（李冬梅编）、《王国维儒学论集》（彭华编）、《李源澄儒学论集》（王川编）、《金景芳儒学论集》（上下册，舒星、彭丹编）、《张舜徽儒学论集》（周国林编）10种12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每书前皆有关于文集传主的评传，末有传主的学术系年。

四、经学与小学

许嘉璐《训诂学与经学、文化（三）》（《文史知识》2010年第1期）指出，训诂学重点的、首要的服务对象是经学，训诂学并不是经学的附庸，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典籍为文化之筋骨，训诂直指文化之根，它与文化共兴衰，是文化传承须臾不可离的重要工具。

许嘉璐《训诂学与经学、文化（四）》（《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着重讨论了训诂学与诠释学的关系及其现代化的问题，文章指出诠释学是研究对文献进行解释的规则学科，是语文学和哲学的混血儿，较之于训诂学，多了几分历史的、哲学的思考。哲学诠释学和传统训诂学的差异在于：诠释学以“假注以述义”为宗旨，训诂学则秉承“述而不作”的精神。诠释学倡导注释多元化、超越元典作者、分开看待权威解释，应该为训诂学所借鉴。训诂学应以文字、语音及历史、文学、艺术、哲学、人类学（含民族学）的方法论、认识论为工具，以一切传统文化文本为范围，以给出足以启迪当世、后世的解释为目的，以理解当世，创造未来为目标。目前，训诂学的现状是名物训诂与义理训诂分解，训诂与经学相分离，训诂与文化脱节，缺乏复合人才，西方思维方法和学科分类存在一定的缺陷，展望未来，要恢复、弘扬训诂的汉、唐传统，“五经”仍然是训诂重点，但绝不能限于经书。要有宏观的视野胸怀，改革人才培养的模式，去掉殖民地心态和自卑。

小 结

本年度经学总论研究，呈现出两大特征：研究内容的全面化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本年度经学总论研究内容可谓全面，在研究的广度上，既涉及对经典本身（经籍整理）、经学流派与分期等传统研究领域，又以经学为轴心，辐射哲学、政治、文学、史学、医学、小学等各个学科。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经学总论研究或分类汇编，或对比研究、或借鉴西学、或历时与共时相结合，方法可谓多样。其中关于经学价值与地位、经学与小学的讨论，学界多采取互动对比研究，对经学与其相关领域或相关概念作互动性的分析，为准确判定经学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新的参考。其中对儒学、经学、政治、伦理之互动关系以及由

此形成的悖论的讨论，尤其值得关注，为考察经学的历史地位和形成过程提出新的多维视角。关于经学与中国诠释学传统的研究，学人采用“中西融通”的方法，在继承传统训诂诠释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诠释理论，阐释和建构中国经学文本诠释学及其历史，从而在深度上拓展了传统经学的阐释力。关于经学分期分派的分析，学者采用历时与共时的方法，以“特征”来统一分期与分派，从双线性的历时角度，形成关于中国经学学派划分的二维纵向架构。

本年度对国学、儒学、经学、训诂学的地位、价值、相互关系以及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新的讨论，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指导性意义。诠释学与经学是本年度的热门话题，学界的讨论集中于借鉴西方的诠释理论，来阐释中国经学诠释学的起源、类型和特征，而如何进一步建构经学诠释学史和经学的诠释体系，是今后学界的期待。

经学历史研究

郑 伟

(四川大学古籍所, 四川成都, 610064)

2010年有关中国经学史的研究, 共计专著4部, 期刊论文104篇, 硕士论文6篇, 论文集2部。研究集中在两汉、两宋、清代和近代四个时期, 内容主要涉及经学流变、经学人物、经学与其他学术三个方面。本年度对于断代经学流变的研究, 主要涉及经学发展与特征、区域经学、经学流派与内在冲突等; 在对经学人物的研究中, 经学思想是本年度探讨的重点, 或探讨经学特质、或评介经学价值, 或梳理学人间的论难与辩驳, 其中从诠释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对相关人物进行的比较研究值得关注; 关于经学与其他学术的研究, 主要涉及与史学、文学、教育、法制、礼制、科举等相关领域的探讨, 其中以对经学与文学的研究为多。

一、先秦经学

周国林《孔孟的经典阐释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9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6月)指出, 孔子对经典的阐释是“述而不作”与述中之“作”的有机融合, 孔子解读经典, 是从一字一句开始的, 但又不拘泥于字面, 而是求大义于词表之外, 而经典解读中的礼乐取向正是这一体现。孔子自称“述而不作”, 以“述”为职事, 但从“礼”到“仁”的逻辑发展, 给礼乐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孟子运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法解读《诗》《书》, 具有开创意义。其对《春秋》地位的抬升, 可以说为后世《春秋》义理的发挥确定了基调。

二、两汉经学

两汉为经学的繁盛期, 有关两汉经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一) 经学流变

于雪棠《西汉诏策与帝王的经学师受》(《东疆学刊》2010年第3期)指出, 西汉

诏策多为帝王自拟，且诏策的风格与帝王的行事个性颇相符契。西汉帝王经学师受的特点是：所学以《诗》《书》和《论语》为主，帝王之师大多由著名经师担任，每位经师都有专门之学，往往一帝多师、一经多师，帝王能够博学“五经”及各家之说。西汉诏策的内容及风格与帝王的经学接受有关，帝王接受不同的经学观念，诏策内容也发生变化。帝王对经学所持的态度不同，诏策风格亦有区别，有和平博大（顺受型）、超奇割切（逆受型）与质直刻深（排斥型）三种类型。

郑子良《试论汉儒经注文献之价值——以〈周礼·春官·典瑞〉郑注一则为例》（《文献》2010年第2期）指出，汉儒经注文献兼具两重性质，即两汉之认识和先秦史的结合，这些古文经学注释文献是一种特殊的史料载体，如果能够批判性地利用汉人注释文献，也就剔除了其构拟成分，准确把握其所蕴涵史料的时代和区域特征，成为后世学者准确了解先秦史料乃至先秦生活的重要依据。

唐元《章句学与两汉儒学风向》（《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 首善文化的价值阐释与世界》，学苑出版社，2010年1月）指出，章句体是两汉经学注释中最重要的文体之一，被广泛地运用于注解儒家经典文本以及其他的文献。在章句学的发展初期，是由训诂的疏略转向章句学的细密和贯通。而随着章句学在发展过程中的过于繁琐化与家学的壁垒化，由细密而反于通约又成为一个与初期路径相反的趋向。而章句学的衰落表示着人们不再勤于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而失去了修身治世的学养根本和风气所尚。这种与东汉政权的政治理念和社会风气相伴而行的儒风的破损，终于使得“世愈移而士趋日异”，章句学不复东汉，士风不复东汉，文风不复东汉，一朝士风之瓦解终于成为了瓦解东汉政权的一个重要推力。

（二）经学人物

这一时期，关于经学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董仲舒、刘向、王充、郑玄等人。

1. 董仲舒

徐克谦《董仲舒与中国经学传统》（《中国儒学》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指出，董仲舒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内容，兼采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学说，建立了一个以天道为本原，以自然宇宙为依据，以天人感应为逻辑，以“改制”、“教化”为措施的全新的儒学体系。其倡导“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天命神授”的君权论，“性三品”的人性论，“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学说，使经学成为可操作的实用之学，奠定了经学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

2. 刘向

尹自永《刘向经学的诠释特点及其价值取向》（《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指出，从解经方法看，刘向经学表现出“以类相从”的独特诠释方式；从蕴涵内容看，刘向经学具有“以经统子”的经子圆融导向；从解经旨趣看，刘向经学体现着“以义行之”的通经致用立场。与西汉宣、元、成时期经学门户林立相对，刘向经学具有强烈的“圆经”价值取向。

3. 刘歆

唐元《刘歆的学术倾向与西汉末的复古及革新——从〈移书让太常博士〉谈起》（《〈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长春出版社，2010年1月），从《移书让太常博士》的前因后果、立论基点——礼制与文献、学术旨归、学术视野、刘歆对《左传》推尊的原因以及与范升《奏难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陈元《上疏难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的系联等六个方面，指出刘歆与西汉末年学术和政治上的复古革新倾向息息相关，在两汉交替之际的学术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继往开来的作用。

4. 王充

张造群《王充经学思想探微》（《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从王充对俗儒及其经解的批判；“书本经末”的“五经”观；“问孔”、“刺孟”，批判“神而先知”的圣人观三个方面，指出王充的经学研究既不同于今文经学以阴阳灾异阐发微言大义而穿凿附会，也异于古文经学拘泥于文字训诂而固守经典。其本着“疾虚妄”的精神，破除俗儒附会于“五经”的种种神圣光环和怪异色彩，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反映了尊重元典、重视原创的思想。

吴从祥《王充经学教育观探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指出，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对汉代经学教育作了不少批判：教学内容囿于“五经”，导致儒生学识不博；重师法家法，导致儒生缺乏创新能力；学用脱离，导致儒生劣于治事；迷信权威，导致知识虚妄不实。因此，王充主张博学，反对专于经学；主张创新，反对墨守师法家法；主张学用结合，反对学用脱离；主张求真实，反对迷信权威等。

5. 郑玄

陈虎、魏崇祥《读书不到康成处 安敢高声论圣贤——试论东汉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与郑玄遍注群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4期）指出，在政治上，东汉时期选官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读书人通过读经进入仕途的路径基本被堵死，加之今、古文经学的弊端，使得经学“家法”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学者摒弃门户之见、兼通今古文之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社会文化方面，白虎观会议对今文、古文经学的统一、谶纬神学的堕落、私学的盛行、造纸技术的进步，为郑玄遍注两派群经提供了有利的氛围。

葛志毅《郑玄研究论纲》（《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指出，郑玄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具体分析郑玄经学体系的诸建构内容，以便从横切面上为评说其经学造诣及其体系特征，提供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根据；另一方面应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历史比较中，为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准确定位。关于郑玄研究的重点，目前应放在综合探索郑玄经学体系的渊源、其体系的内容结构及其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方面，以全面评说郑玄体系的学术贡献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使郑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苏镇东《郑玄的使命和贡献——以东汉魏晋政治文化演进为背景》（《国学研究》第2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指出，东汉中后期吏治的腐败黑暗，动摇了朝廷的统治，使其教化之术遭到质疑。道教趁机崛起，提出了对下层百姓更具吸引力和震